

鲁迅在上海

(二)

山东师
聊城分
院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76686

说 明

一、《鲁迅史料丛刊》（原名《鲁迅生平资料丛抄》）是为高校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一套教学参考书，包括：《鲁迅在绍兴》《鲁迅在南京》《鲁迅在杭州》《鲁迅在北京》《鲁迅在西安》《鲁迅在广州》《鲁迅在厦门》《鲁迅在上海》，除《鲁迅在厦门》外，都已陆续印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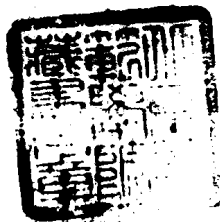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这一辑反映鲁迅在上海十年与文艺青年的关系。

三、《丛刊》由薛绥之同志主编，这一辑是委托上海师大中文系龚济民同志编的，在印刷发行上蒙张厚涵、陈大庆大力支持。

四、限于水平和条件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八〇年一月



776686

目 录

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	许广平 (1)
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	许广平 (17)
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	许广平 (25)
我怎样去见鲁迅先生	冯雪峰 (40)
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	巴 金 (47)
琐忆	唐 弢 (54)
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	萧 军 (60)
回忆鲁迅先生	萧 红 (75)
心中的碑铭	白 兮 (112)
回忆导师鲁迅二三事	白 曙 (116)
不能忘记的声音	李 乔 (123)
关于鲁迅先生的一件事	单家桂 (126)
鲁迅给我的指导、教育和帮助	赵景深 (128)
鲁迅——革命木刻的播种者	周金海 (136)
写在永恒的纪念中	曹 白 (138)
忘却不了的教诲	陈烟桥 (153)
忆念鲁迅先生	钱君匋 (159)
鲁迅先生与“一八艺社”	江 丰 (162)
回忆鲁迅先生在写《文艺与革命》的时候	董秋芳 (173)
关于《答有恒先生》	有 恒 (177)
鲁迅先生与《太白》	陈望道 (184)

鲁迅先生与《译文》	黄 源(187)
鲁迅与《无名文艺》	陈企霞(197)
鲁迅和奴隶社	萧 耘(199)
鲁迅忌日忆殷夫	阿 英(211)
和柔石相处的一段时光	魏金枝(215)
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历史经过略谈	吴似鸿(220)
上海木刻作者协会成立宣言	(229)

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

许广平

鲁迅毕生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，尤其最后十年，在上海为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因为这时有了党的具体领导，方向更加明确；加以自己又不断地努力，学习并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，来运用到中国新文化上，向敌人冲锋陷阵，所向披靡。观其对新月派、民族主义文学、第三种人与杨邨人之流的斗争和揭露，以及《伪自由书》与《准风月谈》后记中所说的事实，鲁迅就是运用简炼、准确的手法，画出一些鬼魂魔影来了。这是在党领导下的胜利，是敌人可耻的失败！

这时与鲁迅有关系的书店很多，粗略计算就有：

北新（青光）	生活	光华
生生	新生	群众
神州	联华（兴中、同文）	
春潮	天马	湖风
文化生活	大江	
合众	水沫	

以上各书店，有关系较久的北新；有后起而出书较多的文化生活社（《故事新编》、《俄罗斯的童话》、《死魂灵》、《死魂灵百图》）。也有专印别家不肯出版的禁书的联

华书局（《花边文学》、《小彼得》、《坏孩子和别的奇闻》等），它有时又改名同文（《南腔北调集》）、兴中（《准风月谈》），没有一定门市，负责人原是北新职工费慎祥，他因家庭生活困难，请求鲁迅帮助出书维持家庭，鲁迅就把写好的几种书交给他印行批发出售的。《毁灭》原列为神州国光社拟出的《现代文艺丛书》十种之一，该社毁约之后，鲁迅愤而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行印出，大部分归光华书店发售的。大概在上海的北新，后来已经与流氓、特务、政客结成一伙，重用李子云、丁默邨，大捧钮惕生，乱登淋病广告，另设伪国旗商店，已经与新书业绝缘，唯以广印活叶文选和反动教科书营利，以剥削作家为能事！实已无可救药之极了。它一面仍用鲁迅做幌子，以青光书局名义出了《两地书》、《伪自由书》、《鲁迅杂感选集》，一面又给鲁迅难堪，“话不算数，寄信不回答，愈来愈甚”（见《鲁迅全集》：卷十，13页），甚至在外看到鲁迅为避暗害、看病多坐汽车，又使人扬言：“鲁迅出入坐汽车，你看他多么有钱！”为自己赖付版税卸责。其实，就是鲁迅找了律师“给他们开一点玩笑”，帐也是算不清的。在上海出版的鲁迅著作后来是领印花去贴，在外地就简直不贴印花，这情况鲁迅是晓得而未予追问的。北新为了和开明书店抢生意，为拉拢林语堂的英语读本给他印行，而先印出他侄子写的文学史，粗制滥造，曾引起鲁迅反感，鲁迅曾经表示，北新如果为政治问题而关门，也是光荣的。事实却相反，北新倒行逆施，甘与敌伪为伍，已自绝于文化界。鲁迅除把一些书交由各书店出版外，又由联华书局出书，目的全是为了革命文学不被敌人扼杀而特行印出的。只要印得出，在读者中间得到传布，即算是对

敌人示威的目的达到了。故由费慎祥出的书，从未结算过版税，甚或自己贴出纸张、印刷费亦所甘愿。这里看出鲁迅为文化事业而艰苦奋斗，不顾一切，凡有路可通，能抗击敌人的都用尽心思去对付了。

反动的报刊杂志虽有，向左翼进攻的压力也不少，但党的领导始终卓立着，大家看到光明的前途有所遵循而快慰，进步的杂志报刊，每于压力稍松，即又纷纷地组织起来，争取公开与读者见面，而鲁迅在上海时与之有关系的杂志报刊就有五十多种。

他初到上海，以编《奔流》花的力量为最多，每月一期，从编辑、校对，以至自己翻译，写编校后记，介绍插图，或亲自跑制版所，及与投稿者通讯联系，代索稿费，退稿等等的党务工作，都由他一人亲力亲为，目的无非是为了要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，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。这就占去了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，其余为各刊物写文章，总觉时间有限。同时，他也不排斥创作，白薇女士的《打出了幽灵塔》的长诗，鲁迅就分期给予刊载。为读者与作者设想，这里，鲁迅是颇费了一点心思的。他曾说：“这样长诗，是要编排得好，穿插得合适，才会有人看的，所以每期的编排就很费斟酌。”这是他同情一个作家，就不惜极力援助她了。而鲁迅又同情杨骚为朋友的热心，他有时就开玩笑地说：“我编排他们的稿件，不是杨骚在前，白薇在后，就是白薇在前，杨骚在后。”

朝花社的搞起来，初时是从厦门大学来的一位王方仁（又名育和）要求住在鲁迅附近，可以常常讨教便利。因之，鲁迅住在景云里时，他就搬到附近租一个亭子间来住，后来

又添了崔真吾，再加进柔石，租住一幢房子，吃饭搭在我们那里，早晚食饭相遇，闲谈到有意译书自行印出的事，鲁迅仍本着以前扶助未名社的态度，替王方仁介绍《红笑》，鲁迅并有一篇《关于〈关于红笑〉》的文章，登在《小说月报》为梅川（即王方仁）辩解，替崔真吾校订《忘川之水》，其目的无非为了帮助青年文化事业，又同意出《朝花旬刊》，出了几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如《奇剑及其他》等就是，又印了几本木刻选集，名《艺苑朝华》，是从鲁迅所藏版画中编印出来，给木刻界有所参考的。但王方仁以有哥哥在上海四马路开教育用品社的方便为词，请求由他的社代买纸张及代为销售，这个建议众人以为是合理，有内行人便利很多，于是王、崔、柔石三人连鲁迅四人共同投资，每人一股，鲁迅除借垫柔石，自任一股外，后来又自动再加一股，算是我的名义，无非增大出书能力，合起来鲁迅担任五分之三。但所用的纸，其实是不合于印木刻图用的，多是从拍卖行兜来的次货，油墨也是廉价的，印出来不是相得益彰，而是一块块、一堆堆不见线条的画，就相形见绌了。但这里，却看到柔石的高贵品质，在据说书与木刻画都收不回本钱，而且还要赔一笔款出去的时候，他毫无怨言，除了出书时的自任校对，奔走接洽都任劳任怨之外，这时又拼命译作，以期偿还欠款，到宣告失败了，还又向鲁迅借垫付出。柔石是忠厚的，还不相信鲁迅说的“人心惟危”（见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），而王方仁则奔走城乡之间，为他家建立祠堂大忙特忙，看不到他搞出书事业。在一次看到鲁迅家中有蔡元培先生在座，他就抓住机会，要鲁迅代他向蔡元培先生请求为祠堂提字，把朝花社的事根本置之脑后了。朝花社结束后，王

方仁从德国洗个澡转回来，他们的教育用品社更昌盛了，还听他向人说，是鲁迅误会了他呢，可惜柔石忠心耿耿，为这毁灭了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业用尽了一大把力，难道这是能用误会二字轻轻遮瞒得过去的吗？幸而鲁迅率直地在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一文中，给柔石留下了真实的性格，使市侩们千方百计无所遁形。

柔石为人诚实质朴，从不多言。每次相见都是与鲁迅谈创作、文学方面的事，看到《艺苑朝华》要印木刻，他也写信到英国木刻家那里，寄去中国木刻信笺之类，换回一些木刻画，似乎转赠给鲁迅作印书资料了。这和王方仁，恰恰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。

另一个青年和王方仁他们住在一起（景云里），名叫韩侍桁。提起此人，我要倒叙一笔。他是日本留学生，在留日时曾投稿到《语丝》来，和鲁迅有书信来往，便算认识了。鲁迅有一次回北京去，他就寄来一张当票，叫鲁迅到京后替他赎出送到他家里去（见《鲁迅日记》1929年4月12日：

“上午得侍桁信并当票一张”）。这种与人方便的事，鲁迅原本乐意做的，就照办了。后来又写信来，要在北京谋事，嘱鲁迅设法。鲁迅想，自己只认识学界中人，就托马幼渔先生代为设法找一教书的职务吧！已经颇有眉目了的时候，北京其时正是胡适、周作人辈甚为得势，问知是鲁迅的关系来的，这事就算吹了。韩侍桁未得做成教员，回到上海后找到了鲁迅，见柔石、冯雪峰等人都住在景云里，和鲁迅接近，而又都是左联人物，不知怎的韩侍桁也“左”起来了。但左联人物并不能升官发财，此路不通！他就摇身一变，往右转了。想着鲁迅既不能利用，骂鲁迅或可以有利用吧！于是跑到南

京，与三个好友在一起，自己躲在背后，叫他的好友去骂鲁迅。如此这般，鲁迅岂有不知之理？所以在《伪自由书》后记里就顺手斥责了韩侍桁一下：“时代的巨轮，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碾碎的。但也幸而有这一碾，因为韩侍桁先生倒因此从这位‘小将’（指革命小贩杨邨人——作者）的腔子里看见了‘良心’了。”这不就画出韩侍桁的嘴脸了吗？

革命越受压迫，作家的革命文学越受摧残。邮局看到红色封面的《呐喊》，不问内容一律禁止。对报刊、杂志，狗们的感觉异常灵敏，嗅到一点味道，立即通风报信，摇尾报功。鲁迅是不管这一套的，反而在他的杂文集里揭发这些东西的嘴脸不遗余力，以揆击敌人，维护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。敌人低能，其实是无能的，例如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取消了原来的编辑，调换一个老编辑张梓生先生，这样，他们以为能弹冠相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殊不知张与鲁迅也是老相识，更重要的是读者爱读这些辛辣的痛击时弊的文字，这是时代推移，人心归向，没法阻挡得住的。所以鲁迅在党领导下能进行一切活动，是与群众联系在一起，与群众生活在一条根上，连老人如张梓生也团结在一起，斩也斩不断，其故在此。

因此之故，当时稍稍有一言半语替群众说话，代表了群众呼声的，有时明遭禁忌，暗则畅销，书店柜台下另藏有左翼出版物，没收一批又有一批，使敌人禁不胜禁，扣不胜扣，真所谓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。这和反动派豢养大批无耻文人，大兴官办书店，但其“作品”却无人过问，恰恰成了强烈的对比。

然而扩大革命影响，增加战斗力量，从文学战线上寻找生力军，仍然是急需的。所以不管任何挫折，仍不能减弱在青年身上寻觅新生力量。这是要费许多时间与精力的，但在这方面鲁迅情愿破费时间与精力。过去，有些人说鲁迅脾气大、不好相与，这是因为他没有和鲁迅站在一条战线上的缘故。鲁迅自己也曾经说过：“现在的许多论客，多说我会发脾气，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，就成友或成仇的人。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，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。”（见《鲁迅全集》：卷十，148页）看看他和许寿裳先生是一例子，又如宋子佩先生，从前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做学生时曾反对过鲁迅，后来他加入南社，认识比较清楚了，和鲁迅成为终身的好友，甚至有时以家务相托，成为极可信赖的一个朋友了。所以，鲁迅是最好相与的，你看他热心出版事业，帮助文化界识与不识的人，凡是损己利人的事，他都是勇于承当的，他念兹在兹的就是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努力奋斗，绝不“因为一点小事情，就成友或成仇”的。“略小节而取其大”，合乎人民利益的是友，反乎此的是敌，这界限是多么清楚啊！尽管他工作是那么积极，在文化界的地位是那么高，但在他自己来看，这纯是份内应做的事，值不得提起的。以前，人们知道他辞掉过提名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；到他大病时，看到《作家月刊》的目录用世界名人像做花边，把鲁迅也摆在里面，他就非常之生气，觉得编者未尊重他的意见而耿耿于心，这是他工作的态度，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也是极其谦逊的态度。

还是从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说起吧，对一个毫不相识的青年，就因为看他有志于翻译匈牙利大诗人的诗，于是就

自己酷爱的藏在身边三十年不易得来的书赠给了他（白莽），这种鼓励译作、热情培养青年战士的精神，不是非常令人感动吗？

另一个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，译了一本《勇敢的约翰》，寄到鲁迅手里，他阅后马上写回信，称赞他：“译文极好，可以诵读。”但又怕介绍到杂志上不方便，就想替他设法印单行本，但鲁迅还须向书店接洽。在解放前，作家受制于书店，这样的情况是常常有的。鲁迅为着介绍一本《勇敢的约翰》，歌颂匈牙利人民的英勇性格，就从1929年11月6日—1931年11月18日止共费时间两年，才把这件事告一段落。其中经过，有鲁迅与孙用来往通信二十一封；与书店或有关人的接洽书信十二封，接洽五次；又鲁迅自己为《勇敢的约翰》制图而亲自跑制版所一次；编校算得出的有五次，最后才由湖风书店将书印成。一书之成，在当时确属不易，其中甘苦，我们从鲁迅与孙用的通信中可以得知大概，现在介绍一二，以便读者了解鲁迅替群众服务的不辞劳瘁的精神，而解放前出版界之难于应付亦可见一般了。

《鲁迅书简》复孙用信第十：

十一月二十七日信，早到。《英雄的约翰》世界语译本及原译者照相，已于大前天挂号寄上，想已收到了。译本因为当初想用在《奔流》上，将图制版，已经拆开：这是很对不起的。

接到另外的十二张图画后，我想，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，于是拿到小说月报社去，想他们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张，并登译文，将来我们借他的版，印单行本一千部。昨天去等回信，不料竟大

打官话，说要放在他们那里，等他们什么时候用才可以——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。

上海是势利之区，请先生恕我直言：“孙用”这个名字，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。Petöfi和我，又正是倒楣的时候（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，现在很受压迫，所以先生此后来信，可写“……转周豫才收”较妥）。译文的好不好，是第二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印出来时毫不时髦。

不过三色板即使无法，单色板总有法子想的，所以我一定可以于明年春天，将它印出。

这是鲁迅从一位邮务员（孙用）的译诗，喜其译作优良，又由诗找到插图，就想图文并茂地印将出来以飨读者的。而制图费又太大，自己负担觉有困难，因而煞费苦心地想借大出版商之力先印出来，但这办法也落空了，终于大碰钉子而回。

到了次年，即1931年的10月6日，鲁迅退而向小书店设法出书。当天日记里这样记着：

午后寄孙用信，并代潮风书店预付《勇敢的约翰》版税七十。得潮风书店信并校稿。

复孙用信十三：

惠函并印花一千枚，早已收到。诗集尚在排印，未校完。中国的做事，真是慢极，倘印Zola（左拉——作者）全集，恐怕要费一百年。

这回印诗，图十三张系我印与，制版连印各一

千张共用钱二百三十元，印字及纸张由潮风书店承认，大约需二百元上下，定价七角，批发七折，作将来全数可以收回计，当得四百九十元。书店为装饰面子起见，愿意初版不赚钱，但先生初版版税，只好奉百分之十，实在微乎其微了。而且以现在出版界现状观之，再版怕也不易，所以这一本翻译，几乎是等于牺牲。

版税此地向例是卖后再算，但中秋前他们已还我制版费一部份，所以就作为先生版税，提前寄上，……

从这里可以看出，鲁迅为革命文化事业，为一个不相识者服务的情况。好不容易算是卖面子才找到一家小书店给印了，自己又垫付出几百元的制版费，连奔走劳力不计，待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，鲁迅就急急又先垫付给作者的版税了。这种丢开自己，首先为他人设想，在旧道德是为人谋而患，在新道德是社会主义风格。鲁迅在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一文中，称赞柔石说：“无论从旧道德，从新道德，只要是损己利人的，他就挑选上，自己背起来。”其实这几句话，也正可以移来用在他的身上。从这书的校后记里我们看到鲁迅为一个青年奔走劳力的痕迹之一般，亦见当时即名为大作家如鲁迅，也和一般作者的命运一样，这就是因为政治压迫之故。其原文如下：

这一本译稿的到我手头，已经足有一年半了，……计划印单行本没有成，便想陆续登在《奔流》上，介绍给中国，一面写信给译者，问他可能访到

美丽的插图。

.....

然而那时《奔流》又已经为了莫名其妙的缘故而停刊，以为倘使这书从此淹没，万分可惜，自己既无力印行，便介绍到小说月报社去，然而似要非要，又送到学生杂志社去，却是简直不要，于是满身晦气，怅然归来，伴着我枯坐，跟着我流离，一直到现在。但是，无论怎样碰钉子，这诗歌和图画，却还是好的，……

——《集外集拾遗》

就因为诗歌和图画是好的，所以不惜竭尽自己的全力来替他张罗出版，这本小书如果不碰到鲁迅，大约在中国未必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的。虽然当时印得不多，而且我们手头也找不到一本了，但总算给中、匈两国人民的友谊留下了一个纪念，这也是想不到的吧！当然，鲁迅为中国新文化事业，为识与不识的青年所尽的力量，绝不仅仅就此一端，我只不过举其一点，以概全般罢了。这就是“好事之徒”的鲁迅，无时无刻不在文化界做些别人不屑置顾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，为作家，为新文化事业尽他能尽的力量。这种精神是可宝贵的，尤其在反动统治阶级大加扑灭文化的时候。

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时，家里用了一个善良而又纯朴的老女工。凡工人有错误，鲁迅是不加呵斥的，而况她对孩子很慈祥，不由令人想起长妈妈来。鲁迅要孩子叫她姆妈，从来不许直呼其名的。每逢我们走向饭厅吃饭的时候，她就来到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大房间里，做清洁工作或带孩子在这里玩耍。有一天，我们吃完饭回到房里一看，她和孩子玩得

正欢，在朝马路的三楼阳台上和孩子一页页地吹纸片，说是放鸢，孩子看到纸片飞舞，忽上忽下，高兴极了，总是要求再来一个。在欢笑之下我们来了，不看犹可，一看，却是鲁迅书架内的一本书被撕去大半本做蝴蝶和纸鸢飞去了，连忙拦阻，才把后小半收回。因为她是文盲，不懂得书的内容，更不了解鲁迅视书如命的脾气，只图博得小孩欢喜，就什么也不管了。鲁迅体谅她，没有加以责备，只戒以后不可再做了。1931年的某一天，东邻有人搬走了，她照往常习惯，仍然领着孩子去玩，回来手内带着一本人家遗下不要的破书，准备给小孩玩。鲁迅接过来一看，是一本《夏娃日记》，那精美的莱勒孚的五十多幅插图和原作者马克·吐温的笔调，迷住了鲁迅，爱不释手地翻了又翻地看个不完。后来又托人翻译了全书。可惜事隔多年，书局也早已倒闭，《夏娃日记》在中国又已绝版了。不然，1960年世界名人纪念中，也可添加马克·吐温这个有名的幽默作家的这一本译著。他原是一个领港，在发表作品的时候，便取量水时所喊的讹音，用作了笔名，是一位美国有名的作家。我们在纪念他的时候能把这本作品拿出来多美呀！却可惜是已经绝版了。鲁迅随时随地抓住机会为新文化运动添一好的出版物的苦心，真是令人感动。

鲁迅对祖国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，都非常关心。凡有可以尽力之处，他都竭尽全力地给予支持和帮助。比如对新兴的木刻艺术的提倡，他就颇费了一些气力的。鲁迅手里有初期木刻家的作品为数甚多，几乎各地方的都有，甚或有本人因流离不定，把木刻寄给鲁迅存下一份，以免散佚的。而鲁迅在给木刻家的通信里，虽然谦虚地说自己不会也不懂木

刻，但看他对青年木刻家们所抱的深切期望，在通信中也直率地就作品中存在的缺点提出意见；并且自己举办外国木刻展览会三次；又花费巨资编印外国木刻大师们的作品以供我国木刻家借鉴；凡此种种，都可以看出他对木刻艺术是热诚爱护、极力提倡的。

中国的木刻艺术，和整个新文化运动一样，是在压迫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。它的兴起、挣扎和成长，也是经过重重困难的。木刻工作者，也是冒了生命危险来保持、发扬这木刻事业的。我们只要读一读鲁迅那篇《写于深夜里》的文章，看看那十八岁青年的被捕，因为查出一个苏联文学家的木刻像就硬说这是“红军军官”，然后一连串的罪状，都从这“红军军官”生发出去，判处有期徒刑“二年六个月”。后来才查明白，祸根是“学生对于学校有不满之处，尤其是对于训育主任，而他却是国民党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。他为了要镇压全体学生的不满，就把仅存的三个木刻研究会会员，抓了去做示威的牺牲了”。这等残害青年的罪恶，是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演出的丑剧。但他们把木刻艺术视为眼中钉却也并不偶然，这不仅是人凡君一人的遭遇，因为木刻是一种战斗的艺术，几乎凡是搞木刻的，都是左倾分子，都受到过反动派的忌恨，好象都该杀似的。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：就是杭州那个美术学校的青年，要出一本关于“一八艺社”展览会的作品，要求鲁迅作序，鲁迅对青年的请求从不拒却的，答应了，写成后而且被印在画册的前面了。临发行的前夕，被校长看见了，就大发雷霆，说有鲁迅的序文，不准发行。一声命令，当即把印好的画册封禁起来，大批堆放在储藏室里，让它们长期过着禁闭生活，不能和读者见面。有一位这个学校